

衛生的現代性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415pp.

張淑卿*

《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一書，主要是探討「衛生」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與脈絡中所呈現的意義。十九世紀之前，「衛生」意味著一套個人飲食、行為，以及自我療養的養生方式。隨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與中國人討論如何達到現代化之時，「衛生」一詞的意義，自原來中國宇宙論的範疇，移轉至國力、科學進展、身體清潔，以及種族健康等面向。Rogaski 稱這種「衛生」意義的改變為「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並指出「衛生」在十九至二十世紀時，如何影響天津市的發展，以及面臨外力入侵與佔領時，「衛生」如何變成天津菁英分子的討論中心。

作者在緒論中指出，衛生無時無刻地滲入中國人的生活。無論是針對現代人或建立現代的生活環境所發動的「講衛生」、「文明衛生城市」，以及「愛國衛生運動」等運動，或對現代國家的整體想像，衛生均是中心要素（頁2）。為了理解衛生與現代國家社會之關係，Rogaski 將重點放在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改變，特別是通商口岸的醫學發展。作者要處理的問題

* 長庚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有二：（一）在都市環境中，指出健康定義改變的意義。（二）外國勢力於 1858 年進入天津後，天津的政治發展與衛生現代性之間的關係。1858 年英國海軍將「西方醫學」帶入天津。1900 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兩年後回歸中國。1910 年代，歷經袁世凱政權與軍閥政治。1928 年後，天津雖重回中國懷抱，但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又淪為日本佔領區。以上多變的政治環境與衛生實作、市民的就醫習慣、飲水衛生、城市空間安排以及排泄物處理等也產生變化。特別是菁英分子，他們將個人衛生實作視同為國家強盛與種族健康的象徵。為解決以上問題，作者首先將衛生現代性置於醫學史中，特別是放在殖民醫學史的脈絡上，使得衛生與健康不再是全球現象，而是透過殖民／被殖民重新詮釋。其次，作者也說明衛生現代性的追求，如城市的空間規劃和屎尿處理改變城市景觀。最後，作者指出「衛生」一詞的翻譯，賦予衛生新定義：衛生是擺脫傳統，提升國族，進入現代文明的手段與方法。

以天津作為研究場域，主要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為中國最繁忙的港市之一。天津除了有中國的統治區，也有多國的佔領區，這使得天津市的區域劃分、建築，以及警政權均呈現本地與外力的競逐現象，同時顯現天津市「次殖民地」的複雜性（頁 3）。因此，本書橫跨了醫學史、城市史與翻譯研究等學術領域。

全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有 10 章。第一章概述傳統中國時期衛生的意識與實踐。第二章聚焦於開港前，天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衛生狀況。第三章討論 1860 年代英國軍艦傳入「西方醫學」，並比較這種新式醫學與當時中國傳統醫學與治療方式之間的差異。第四章進一步討論，如何由中文字彙「衛生」一詞翻譯出「西方式衛生」(western ways of hygiene)。作者認為翻譯「衛生」時，充滿高度的選擇性與矛盾。「西方式衛生」的翻譯使得「衛生」一詞，脫離抽象討論，轉向具實驗室的實作意義。第五章闡述日本明治政府衛生官僚與醫生，用「衛生」(eisei)概念，將個人健康與國家健康相結合，當作是衛生現代性的起源。1900 年之後，日文的「衛生」一詞的新內涵對中國影

響甚深。

第六章處理八國聯軍之後，天津被不同的外力侵佔，衛生與健康問題成為外國政權的施政重點，當中顯示日本在此佔領時期所扮演的主導地位。1900年之後，「衛生」獲得了「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的政治意義，在西方國家中，衛生技術的良窳是評斷國家主權及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清政府為了重新獲得天津的統治權，設置「衛生局」，「衛生」遂成為中國表現主權的基石，同時又是形塑中國民族缺陷論的要素。「不衛生」顯示中國政治、社會與個人是一個落後、病態的狀態，追求衛生不僅是個人身體，更是國族集體的提升。第七章則敘述為了製造符合衛生的都市環境，現代性的動力如何分化，與隱藏各項生活機能。第八章探討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各種「衛生」概念的再現，特別是中國的學者和醫生將不講衛生視為中國人的缺陷，其解決之道為從個人衛生習慣之改善，到民族衛生之討論。到 1930 年代後期，「衛生現代性」幾乎難與傳統的「保衛生命」形成交集。第九章討論中日戰爭期間，日本的細菌戰策略，細菌成為中國人對抗日人的敵人。影響所及，至 1950 年代時，中共進而將敵人（美帝）視為細菌，1952 年韓戰時期的「愛國衛生運動」，數以萬計的中國人開始對抗細菌，消滅細菌是反帝國主義的一環。「衛生」搖身一變，從個人的預防疾病措施，轉變為全體中國人對抗美帝的戰爭。

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Rogaski 不僅廣泛運用官方檔案、醫家著述、時人著作，以及近年來對醫療衛生史、現代性的研究，如 Warwick Anderson、Bridie Andrews（吳章）、David Arnold、Carol Benedict（班凱樂）、Frank Dikötter（馮客）、Prasenjit Duara（杜贊奇）、Mark Harrison、Gail Hershatter（賀蕭）、Nathan Sivin（席文）、Shu-mei Shih（史書美）以及雷祥麟等人的學術成果，同時關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醫學對中國（台灣，甚至是東亞社會）的影響，另外也多處引述現代西方醫療、衛生之發展，因而呈現出多樣的內容。然而，閱畢本書後，仍有一些觀點，或許可以再進一步思考與討論。

首先，關於「現代性」“modernity”一詞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文化研究上，已有眾多的研究成果。「現代性」大致以啟蒙時代或十七世紀為分界點，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來臨，導致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變遷。加上市場消費、個人主義、公共領域，以及大眾媒體的發展，使人以追求「進步」(progress)作為理想與目標，並與落後的過去決裂，邁向更開放的未來。¹現代性的研究帶給歷史學界的衝擊與影響應是挑戰傳統實證史學的研究方式，提供更多重面向的探討與認識。在現今學界，「現代性」儼然成為學者分析亞、非、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區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取向。以美國學者 Tani Barlow 提出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為例，Barlow 以「殖民現代性」討論「現代性」一詞在東亞歷史中的具體意義，並強調殖民主義在形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現代經驗時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說明現代性引介的過程中，與在地社會文化體系的互動關係。²但是，作者雖將「現代性」(modernity)做為書名的一部份，然書中卻未針對「現代性」的定義做進一步的討論。如果依 Peter Brooker 在《文化理論詞彙》一書，對「現代性」的定義是：現代性描述的是「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的長時期演變，而且最常被指為是自十八世紀啟蒙與 1789 年法國革命到二十世紀二次大戰後時期的兩個世紀。³Tani Barlow 所說的「殖民現代性」，強調的是社會文化的互動過程。但作者似乎不想陷入「現代性」理論的討論，選擇以透過當地社會文化與傳統醫學的對話，以及現代衛生制度的建立，呈現所謂的「現代性」。然而，此種呈現方式，讀者看到是天津社會裡醫學與統治技術的發展，依 Peter Brooker 的看法，這些顯現於醫學、健康照護的改善，均屬於「現代化」，而

¹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69-170。

² Tani E.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另參見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台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會秘書處編，《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頁1235-1257。

³ Peter Brooker 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頁253。

非「現代性」。

Rogaski 在書中也未明確定義“hygienic”一詞。不過，作者從長與專齋(Nagayo Sensai)、緒方維準(Ogata Koreyoshi)、後藤新平(Goto Shinpei)、森鷗外(Mori Ogai)，以及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等人的作品與科學研究成果中，說明日文「衛生」(eisei)一詞的演變過程及其意義的轉變(詳見第五章)。作者認為，在二十世紀初，「衛生」被明治時期的醫學菁英人物重新解釋，成為殖民醫學的要素，「衛生」具體化的表現則是衛生警察、強制隔離、大規模的排泄物顯微鏡檢查，以及衛生習慣調查等。我們從本書也可以看到與衛生有關的英文辭彙，包括：health(健康)、hygienic(衛生的)、physiology(生理)、nutrition(營養)、clean(清潔)、medicine(醫學)、sanitary science(衛生學)等，但作者並未進一步討論這些字彙本身與社會文化之關係。由於這些醫學名詞的背後代表著來自不同的醫學衛生傳統與醫學理論，這些新名詞的接受時間與觀念的轉變，與當時社會文化環境亦有關係。如醫學史學者劉士永教授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地區公共衛生觀念的遞嬗過程，指出1920年代台灣社會已習慣於使用「健康」與「衛生」二詞，但至1945年以前，台灣社會並非人人習慣於接受殖民政府相關的衛生政策。⁴對Rogaski而言，藉由實際操作的過程，可清楚呈現「衛生」如何從養生方法，到個人衛生、公眾衛生，以及種族衛生之轉變。但是，「實作」是執行某項官方的衛生政策，本書作者並沒有對天津人民何時改變舊式衛生觀念與行為，何時全面接受新的衛生觀念，作詳細說明，以致於忽略了相關詞彙與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相關性。

作者論及1920至1930年代，特別是優生學者討論「衛生」與「優生」之間的關係時，「衛生」與否乃是評定民族強弱與優勝劣敗的象徵。然這種討論非中國特有現象。如英國學者Frank Dikötter(馮客)提及，在兩次世界

⁴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台灣史研究》，卷8期1（2001年10月），頁67-75。

大戰之間，全世界的優生學都將薄弱的個人權利概念與強勢的生物化世界觀聯繫在一起。亦即，個人行為附屬於國家的集體利益之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均有所改變，優生學即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運動中。優生學與一個國家的進化或退化，文明或現代化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又與新興學科，如婦產科、性學、心理學、犯罪學，以及公共衛生密不可分。它成為菁英分子將其個人對於國家社會秩序之認識，客觀地建立在一個具有自然規律與科學基礎的世界裡。公共衛生、種痘，與大規模的清潔運動，被視為可改善衛生狀況，預防傳染病，進而改善中國人種的一種手段，同時民眾的衛教和嬰幼童的健康檢查也受到重視。⁵

Rogaski 對於民族衛生之討論，是以民國時期優生學者潘光旦為主。潘氏並不認為可以透過公共衛生措施、環境，以及教育來改善中華民族的健康，他認為唯有讓擁有優秀基因的人口增加，才是提升民族健康之道。換言之，健康是來自遺傳，而非衛生行為，欲解決中國的問題，民族衛生是主要出路（頁 204-243）。潘光旦的衛生是優生學，他攻擊衛生機構的設置與環境衛生的改善政策，認為這是無效且浪費錢的做法。Rogaski 在第八章指出，優生學者潘光旦與消費者、國民政府的西醫師、傳統中醫師的看法不盡相同。消費者與西醫師呼籲追求西方的衛生行為與生活方式，而中醫與優生學者則與其相左。作者說明優生學者的論述強調，衛生不僅是關係個人健康，更重要的是涉及種族強盛。但是當衛生與優生產生相連結時，政府該如何操作民族衛生，以產生優秀人口？因為從強調運動、體操、疾病控制、人口調查統計，到納粹式強烈的滅絕猶太人做法，均是強調「優生」、「強種」。民國時期某些政策如新生活運動、娼妓管理或性病管理，不僅與優生有關，同時也是衛生習慣的養成與衛生政策的執行，其背後有著「強國強種」的意涵。換言之，因涉及對民族衛生的論述與操作策略，或許作者可以稍做進一步討論。

⁵ 馮客著，周遜譯，〈個人身體與群體命運——近代中國之人種繁衍和社會紀律〉，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204-222。

如同作者所言，這是涉及城市史研究的作品（頁4）。然而，以衛生作為現代性的追求手段，絕非僅於天津。其他通商口岸如上海、廣州、寧波和廈門等，亦有相似的政治與社會環境，Rogaski 書中很少論及上海等地的衛生改革，她僅強調天津開港後歷經四個政權統治的特殊性。因為通商口岸通常有多國租界區，也曾歷經清朝和國民政府統治，若 Rogaski 能稍加指出天津與其他通商口岸異同之處，則更能凸顯本研究之價值。

醫學史學者李尚仁曾提到：「帝國主義及其所影響的當地社會對現代性種種願景與建構，是理解十九世紀以來亞洲醫學史的關鍵。」⁶因此，Rogaski 的研究，則顯示歷經四個不同政權的天津，以衛生做為一種追求現代化之方式，不僅看到衛生觀念與實踐的轉變，也看到衛生如何成為擴張國家權力的關鍵。當西方科學或醫學進入非西方社會時，可能無法僅以「挑戰與反應」或「帝國與邊陲」做為解釋兩者間的衝突，及其與當地政治局勢、經濟社會結構、文化觀念與價值，和國家民族的認同之關係等，也將促使當地社會重新思考科學或醫學，而此一轉變與磋商過程的意義可能遠勝於結果。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觀察，此書確是一本理解現代醫學與東亞社會的重要醫學史（或殖民醫學史）著作，同時以衛生做為城市空間、國族提升的一個討論重點，相信亦能擴展城市史或現代性研究的視野。

⁶ 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54（2004年6月），頁3。